

理性 X 感性

文 / 王本榮 慈濟大學校長、花蓮慈院小兒部主治醫師

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有關左右大腦英文雙關語的短文，深覺有趣：「Your brain has two parts, the left and right; your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, and your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」。意譯是「你有左右兩邊大腦，但你的左腦一無是處，你的右腦一無所有」，罵人不留餘地，很像前衛生署楊署長斥責臺灣人「理盲濫情」一樣痛快淋漓。

神經學家常以二分法將左腦籠統化約為屬於分析的、邏輯的、語言的、計算的、有時間順序功能的；右腦則屬於音樂的、藝術的、創造的、抽象的、空間與印象功能的。但事實上，左右大腦大同小異，且互動頻繁，太強調「邏輯的左腦」與「情感的右腦」，就像在政治主張上將資本主義劃分為右派，將社會主義歸納為左派的二分法一樣，太過簡化，也不精確。



經典雜誌出版

感性人類 情緒訊息流量高

情與理的衝突，是人類最古老至今仍無法迴避的命題。除了左右腦半球的分工與聯結外，人類大腦必須順應內外環境的變化，並在文化教育的指引下，調整欲望，管控情緒，決定行為模式，這關乎大腦額葉新皮質與深層邊緣系統的上下連動。邊緣系統包括海馬體、杏仁核、下視丘、視丘、扣帶腦迴與腦下垂體，是心智與身體的聯結，也是思想與情緒的交會。邊緣系統掌管了記憶情緒，較本能的行動與驅力。人類大腦是長期演化的產物，無論在結構與功能上，都潛藏著生物演化中的痕跡和記憶。而主宰情緒的邊緣系統引發向上的神經訊息流量，遠多於代表理性的大腦皮質向下調控的訊息流量。從這個角度觀之，我們只是「摩登原始人」或「古

早現代人」。心智運作交雜著兩個系統，緩慢的邏輯思考系統，卻建構在一個流量更大、更快速、難以掌控的本能心智上，這也是人類欠缺長程遠見，慎謀能斷的規劃能力，而只是短視近利，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者；我們仍稱不上是理性的動物，充其量只是善於合理化的動物。

理性感性的輪替 歷史發展的脈絡

而中外歷史文化，也無不在「集體主義」與「個人主義」之間，「理性原則」與「感性原則」之際，衝突起伏，擺盪拉鋸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，群雄併起，社會動盪，形成了思想的百花齊

放，百家爭鳴。「諸子百家」不但是學術的系統流派，也是諸侯的政略智庫。秦朝勵行法治，以兵刑威服天下，漢朝獨尊儒術，以經學治理天下，服膺的都是「理性原則」。魏晉南北朝是針對秦漢「集體主義」的反動，以道家三玄為尚，開啟了中國個人自由主義的先河。唐朝文化多元但本質是英雄與文學的感性時代，服從的是「生命原則」。宋朝理學闡揚儒家的義理，重視「修己」，又回復到「理性原則」。元明更將「四書」明訂為科舉的官方教材，使儒學走向「官學」之路，重視「治人」更甚於「修己」。清朝外族統治，走向了軍事統治的極權主義。「五四運動」及「文化大革命」皆盲目地反對禮教，徹底摧



慈濟大學畢業的曾御慈醫師車禍身亡後，將器官捐出，王本榮校長在追思會上為曾醫師獻花致意。攝影／李家萱



毀固有文化，將中國從傳統相對的權威主義，帶入絕對的權威主義。

西方文化的源頭是希臘哲學，集大成者是蘇格拉底 (Socrates)、柏拉圖 (Plato) 及亞里斯多德 (Aristotle)，主要主張是以理性去探討宇宙或人生的真相，並藉此指引現實生活。而中世紀哲學是由西元二世紀綿延至十五世紀，這個時代政治上 是羅馬帝國，宗教上是天主教所主導。而哲學家的勇於思考常受限於政治的保守性格，宗教的僵化教條，逐漸喪失創新的活力，阻滯了多元、開放及自由的思維，而被後世污名化為「黑暗時代」。十五世紀的「文藝復興運動」是西方文明進化史最重要的轉折期，以回歸希臘人文主義為號召，將歐洲從一個政教封建社會進化為現代文明社會。透過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，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，至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 (Enlightenment)，彰顯了理性的一切潛能，並勇敢的應用於公共事務，催生了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。而興起於德國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 (Romanticism) 是針對啟蒙運動引起的反動思潮，主張以豐富的生命整體取代單調的理性分析與概念架構，並強調個人的獨特性及通過意志的自我創造力量。

啟蒙運動也在日本明治時代被引介至日本，特別是福澤諭吉的啟蒙思想對日本擺脫江戶幕府的封建體制，建構全新的價值觀，發揮了主導的力量。然而「脫亞入歐」，發展為現代化國家的日本，卻以「軍國主義」之姿發動泯滅人

性的侵略戰爭，令人難以理解。《菊花與劍》的作者貝內迪克德 (Benedict) 研究日本獨幟一格的「義理人情」文化，指出義理並非公理，只是一種「不得不履行的義務」，關乎社會的規範，輿論的壓力，名譽的維持，契約的履行，信賴的呼應，情意的回報，是儒家文化與武士道精神的綜合體，無所不在地影響日本人際與社會關係。在義理與人情無法兩全的情況下，日本人常會以義理為先，但義理並非內化的理性，而常是偽裝的道義，也容易演變為虛禮。日本人常在失敗的時候才會反省，在東窗事發後才肯認錯，甚至激烈地以死謝罪，並不是事前「知恥」，而是事後「羞恥」。相對於日本的「義理人情」，以漢人為主體的臺灣移民社會縱然在民主開放後，仍是一個「人情義理」的社會，情先於理，理重於法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像是重重的蜘蛛網，架構在應酬及對價的基本概念上，有遠近親疏的分別，也是加減乘除的算術。「人情」兩字，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感性層面；但俗語說：「人情似紙，世態炎涼」，說穿了更像是一種隱形的交易，一旦接受了人情，請託了人情，就如同承受無形的債務，也會衍生人情的壓力。政治與商業更毫不避諱的利用人情來控制他人，謀求利益，關心與關說也很難釐清。在人情掛帥的文化裏，政治無法清明，社會難有公義，也就不問可知了。對個人而言，我們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，恰恰正是製造問題的根源，接受人情，再來償還人



本身是小兒科醫師，長期與小朋友互動，因此王本榮校長在理性的醫學邏輯中，也常常帶著感性幽默的談吐。圖為王本榮校長到菲律賓義診。攝影／李家萱

情；製造壓力，再來抒解壓力，使我們成為人情的奴隸，難以脫身。

從理盲濫情到通情達理

被批評「理盲濫情」的臺灣社會之集體潛意識中，很簡單的把「感性」狹隘為情緒，把「理性」高舉為智慧，實是天大的誤解。功利導向的「理性」常是「極權」、「征服」與「貪婪」的美白劑；自我中心的「感性」常是「民粹」、「墮落」與「無明」的催生劑。「理性」是嚴謹的辨證推理過程，用於驗證思考及主張的內在正確性，然後再參酌「感

性」做出價值的判斷與抉擇，兩者應該相互依存，而非相互對立。每一個人都有其「道理」，但相差何止「道里」計；每一個人都有「感情」，但容易兩極化為「激情」或「無情」，是臺灣社會面臨最大的危機。由歷史的軌跡觀之，無論是重視理性集體主義的時代，或是服從感性個人主義的時代，都潛藏著極大的反動危機。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，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，感性與理性的平衡，內在與外在一致，只有每一個人都是「通情達理」的公民，才有可能建立一個高度文明的理想社會。🌱